

“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

——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

□ 武晓超

巴黎公社革命是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伟大创举。然而，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革命仅仅72天就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了。何以失败这么快呢？毛泽东指出，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到公社委员会及其救国委员会，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的缺憾，是巴黎公社革命功成身败的沉痛教训。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争权、越权，在政治领导、军事指导上制造混乱。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完成其临时革命政权的历史使命，将政权移交给巴黎公社最高权力机关公社委员会。但仅过了一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要求公社委员会承认“公社是巴黎的政治和民政的权力机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军事权力机关，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3月31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擅自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4月1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委员会要求任命参谋长、负责军需工作的权力。4月2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更无视公社委员会决定擅自出兵凡尔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而遭受惨重失败。4月16日，瓦尔兰等多名委员被补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开展工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更加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莫罗、巴鲁等人公然召开国民自卫军代表大会，加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作用，成立了11个委员会，俨然要成为与公社委员会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权。5月初，巴黎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不仅违背公社制度和军事秩序擅自调派军队，而且加紧策划颠覆公社政权。5月8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启用特别制服和特制签章。5月9日，公开要求实行军事专政。5月23日危亡之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告“解散国民议会和公社”，动摇巴黎公社和人民的信心决心。

在带领武装起义和创建巴黎公社的过程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下了大功。但巴黎公社成立后，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背弃政治诺言，无视纪律规矩，与公社委员会争夺政治领导权、军事指挥权，严重影响了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重破坏了公社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斗争，进而加速了公社的失败。

公社委员会平权、分权，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纪律乱象频现。巴黎公社委员会成立后，3月29日会议决定划分成10个委员会以便开展事务和讨论法令草案。其中，每个委员会大致由5—8名委员组成。在组织结构上，巴黎公社委员会既没有实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也没有采纳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一分部一支部体制，作为会议主席的贝雷将巴黎公社作为地方分权和自治的模范。

巴黎公社委员会缺乏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难以产生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公社委员会层面，最初曾提议选举产生由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组成的主席团，并建议任期一周。但仅有第一届主席任期5天，4月5日起每次会议都临时选举主席，职责限于主持会议。在公社存在的72天中，先后有28名委员担任会议主席，有时竟然一天两名主席。公社委员会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相当于政府部门的10个委员会层面，执行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更为突出，“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但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不比其他公社委员具有更多威望和更高能力，各委员会之间相互平权、各自为政，甚至无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4月20日，公社不得不改组执行委员会，办法是由9个委员会各选出1名代表，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各委员会之间的沟通联系加强了，但是平权分权的问题并未有效化解，公社仍然难以摆脱“九龙治水”的困局。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乃至割裂，是平权分权问题的最集中体现和最严重后果。在巴黎公社里，蒲鲁东主义者在财政委员会、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中占多数，布朗基主义者在军事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治安委员会中占多数。正如恩格斯所说，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当不

同的法案提交公社委员会决定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中遇阻、相互掣肘的情况屡屡出现。在蒲鲁东派看来，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崇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和革命专政，对公社的关于处置敌产和逃亡分子的法令、取缔反动报刊的法令、关押人质的法令等横加阻挠，致使法令流产或付之空文，“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严重动摇了革命政权的稳固和政治权威。在布朗基派看来，他们只是出于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更不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事务，在对待法兰西银行问题上一误再误。据统计，在法兰西银行里存有三十亿法郎资产，公社仅从中支取了一千六百万法郎，梯也尔反动政府却从法兰西银行得到两亿五千七百万法郎的资助。5月12日，治安委员会以搜查秘密军火库为由包围法兰西银行，由于贝雷的阻挠再次无功而返。恩格斯指出：“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围绕救国委员会权责争执不休，宗派主义激化内部分裂。为了破解组织涣散、政令难行的问题，4月28日公社会议上，公社委员米奥提议组织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只对公社负责，对其他一切委员会享有最广泛的权力。关于是否设立救国委员会，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之间的分歧愈加严重。布朗基派联合新雅各宾派等形成多数派，赞同公社的集中统一以应对更加严峻的军事形势。蒲鲁东派认为这是对公社民主原则的破坏，成为持反对立场的少数派。

5月1日，公社组织选举救国委员会，蒲鲁东派拒绝参加投票。最终37名公社委员投票选举产生5名救国委员会成员，其中3名布朗基派、2名新雅各宾派，都属于多数派。5月3日，救国委员会越过军事委员会和军事代表直接发布军事指令致使阵地失守。围绕救

国委员会的权限和行动，多数派和少数派展开了连续3天更加激烈的争论，少数派要求取消救国委员会。5月9日，巴黎西北的伊西炮台被攻陷，公社重新选举救国委员会。这本来是弥合分裂的宝贵时机，多数派委员却在休会间隙单独协商，因而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届救国委员会仍由3名布朗基派、2名新雅各宾派组成。5月12日，第二届救国委员会需要补选一名委员时，多数派无视少数派候选人瓦尔兰的威望和能力，再次投票选出一名多数派委员。此后，多数派还在治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中进一步排挤少数派。建立救国委员会的本意是加强集中统一，却被多数派致使排除异己、专权擅权的工具，致使公社内部的分歧、分裂更加尖锐了。

多数派的宗派主义做法激起了少数派的强烈反对。5月15日，少数派22名委员公开发布声明称，由于公社“把权力移交给一个名为救国委员会的专制机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不再出席公社会议。少数派声明将内部的分裂公之于众，打击了巴黎公社的威信，引发了革命队伍的混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政治危机。5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号召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统一，巴黎市民也召开选区会议号召本区委员回到公社去。在革命团体和人民群众的呼吁下，5月21日，少数派回到公社出席会议，多数派选举少数派担当会议主席，两派消除隔阂，再次携手共同御敌。然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在随后的“五月流血周”里，公社委员们浴血奋战、奋起反抗，但最终还是在5月28日遭到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勾结普鲁士军队的联合反扑，公社宣告失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惨痛教训。



杰克·佩里：新中国中英贸易交流的“破冰者”

□ 谢 廷

由于重视应用新技术和生产质量，佩里的女装厂在二战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在伦敦设了三家分支机构，在南非、澳大利亚也开了新工厂。1950年，佩里与妻子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从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到印度、埃及等地，旅行让佩里目睹第三世界的极度贫困，并因此感到震惊和难过，也让他坚信有必要了解世界各国国情。

冲破阻挠开启中英贸易交流的“破冰之旅”。1951年夏，佩里在参加罗宾逊夫人邀请的晚宴上认识了来剑桥大学讲学的冀朝鼎。冀朝鼎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中国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与禁运政策不断升级。罗宾逊夫人认为，这一制裁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于是鼓励佩里与中国方面多接触、促进双边贸易，还邀请他负责次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英国民间代表团的组织工作。佩里同意了这一建议，在罗宾逊夫人和冀朝鼎的鼓励和帮助下列上了从事中英贸易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道路。

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佩里作为英国民间代表团秘书长顶着英国政府、媒体的批评压力毅然参会。他在会上建议：各国应该召集整个企业界和经济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会议期间，佩里和冀朝鼎安排了中英两国代表团会谈，双方签订了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活动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恢复西方国家与新中国的贸易创造了条件。佩里还与冀朝鼎、卢绪章等中方代表进行了深入接触，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了大体了解。会议结束后，佩里回国放弃了在女装公司的职位，成立了伦敦出口公司，专门从事

中英贸易工作。

1953年6至7月，佩里冲破有关方面阻挠、克服重重困难，组织了由16名商人参加的英国工商业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并与中方签署了总额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协议规定，英国向中国出口五金、机械、医药和医疗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10类产品，中国则对英出口粮油畜产品以及茶叶、丝织品、手产品等10类产品。这次访问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坚冰”，被称为“破冰之旅”。此访后，代表团成员集中精力开展就禁运名单中的商品申请许可证活动，通过弱化商品名称来避开贸易管制，使化学药品、机械、电信交通设备等更多商品进入中国，逐渐推动英国政府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1954年4月，为进一步落实上年签的协议，佩里等48家英国工商企业代表在柏林与中国进出口公司进行会谈，并组建了旨在推动中英民间贸易发展的“48家集团”，带动西欧各国同中国的贸易和交往。佩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访华的英国贸易代表团和“48家集团”的发起者，被誉为中英贸易交流的“破冰者”。

薪火相传的“破冰精神”。“破冰之旅”给佩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善、勤劳，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改变落后面貌、重建国家的决心所震撼。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共产党领导他们（农民）得到解放，把他们从出生起就受到的地主压迫、暴力、恐惧和绝望中解放出来”“面对落后状况，（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要让中国人对自己重树自尊和自信——不能靠回忆过去的光辉，而是要靠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新社会，大家一起努力不断改进生活水平”。并表示“我决心尽可能地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走在同一条希望之路上，和他们一

起，帮助他们远离可怜的饥饿、贫穷和痛苦，建设一个有希望、有盼头、有未来的新国家”。在此后40多年里，佩里都在为促进中英贸易及两国关系发展作巨大努力。他一生访华76次，在华开办14家合资企业，组织开展工业技术交流活动，有力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他还推动中英两国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1984年，由他率领的英国桥牌队第一次访问中国。1987年，他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给本科生讲授对外贸易理论和中英贸易发展历程。1990年，中国贸促会授予佩里荣誉会员称号。

1982年，在参加中国贸促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时，佩里回顾了自己的两大愿望：“第一，打破美国禁运。第二，促进中国同西方贸易”，并表示“三十年来，我有两个爱，我爱我的家庭，我爱中国”。佩里正是秉持着“贸易是创造相互依存的黏合剂，可以带来富裕、稳定与和平”的理念和对中国的深厚友情，以“破冰精神”战胜了西方对华质疑、偏见的意识形态“坚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

1996年12月12日，佩里在英国家中逝世。其子斯蒂芬·佩里继承父志，接任了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积极推进中英经贸、文化交流，并倡导成立“青年破冰者”和“女性破冰者”组织。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斯蒂芬·佩里作为“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荣获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斯蒂芬的儿子小杰克·佩里，作为“青年破冰者”组织的创始主席，今天继续为推进中英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与了解而奋斗。佩里一家三代为中英贸易人文交流所作的努力，展现了“破冰精神”的薪火相传。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显著特征，这在史前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1986年，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提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说”，论证了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分层式向心结构。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朵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是花瓣，各文化区彼此相联而又各具特色，中原文化区更是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

“重瓣花朵说”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及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为从史前文化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基础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而通过新石器时期中原文化区这个花心的发展演变，可以窥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些史前文化印记。

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中原地区的文化谱系大致经历了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主脉络。磁山—裴李岗文化形成于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现，在距今约9000—7000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均发展了早期农业，出现了房屋与窖穴的定居聚落，以及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炊煮陶器等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尤其是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遗址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发掘了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炭化稻，以及刻有符号的龟甲和鹤类翅骨制作的骨笛。这表明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规模较为可观的聚落，也出现了社会分工和文明起源的端倪。同属仰韶文化源头的河北磁山文化，也发掘了面积可观的聚落群遗址，以及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家畜骸骨和窖穴堆积的大量炭灰。这一时期，磁山—裴李岗文化的粟作技术已经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大部分地区，制陶、骨笛、石器制作、龟甲契刻等文化因素影响至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以及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尤其是受到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存在一定的交流联系，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在距今约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均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农业进一步发展，人口数量（聚落数量）显著增多，聚落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以红底黑彩花瓣纹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聚落数量多达5000多处，聚落规模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农业经济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来源，形成于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仰韶文化底陶类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整合，花瓣纹彩陶的影响辐射范围甚广，东至海岱、西达甘青、北逾燕山、南抵湘江甚至远至蒙古高原，基本覆盖了后世中华文明的主体区域，形成了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在仰韶文化后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聚落分化和阶层分化现象，甚或已经具备了“古国”的早期形态，点燃了文明时代的第一缕曙光。而仰韶文化本身也是“多元一体”融合而成的文化，其源头包括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陕西老官台文化（甘肃大地湾文化），同时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着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比如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中的玉器制作、长江中游彭头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文化印记

□ 平维彬 孔新峰

山文化的稻作农业等。

距今约5000—4500年前的铜石并用时代，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冶铸术、石器制作技术（管钻法和切割法）、制陶工艺（快轮制陶）、建筑技术、玉器加工等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出现了掌管公共事务和军事指挥权的领导阶层，形成了阶级、王权、都邑等文明形态的产物。阶级的出现和都邑的产生，既反映了该时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显著增多、聚落规模扩大，也反映出社会分化严重、聚落（群）间关系复杂化以及战争的频发。超大型中心聚落是该时期由原始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标志性产物，聚落群内部以及聚落群之间出现了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因素，史前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正经历着中国史前社会的大转型：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型、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型、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型、从原始社会向王权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基本上同步发生在中国的大部分区域，延续着中国早期文明整体性发展的步调。

进入古国时代（距今约5800—3800年）之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是融合吸收仰韶后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西辽河小河沿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包括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陶寺文化以及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在内的中原龙山诸文化，更显著地呈现出“一体”与“多元”相结合的特征。该时期的中心聚落面积通常可达几百万平方米，比如陶寺古城约300万平方米、石峁古城400多万平方米、瓦店古城100万平方米。这一时期的中原诸龙山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加固、箭镞等武器的进步、掌握军事权力的王权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文化激烈竞争的明证。在古国时代晚期（距今约3800年），中原龙山文化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各种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诞生了二里头文化，为日后璀璨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基，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化的新阶段——王朝时代。

纵观中国史前时代，中原文化在自我发展辐射周边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借鉴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因素，才造就了中原地区在史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并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力量。

